

北伐前夕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谢 经 华

北伐战争前夕,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北方的革命运动也逐渐形成了高潮,成为中国大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五卅”运动后,北方的形势也逐渐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执委会议,决定单独成立中共北京地委(原与北京区委没有分开),扩大原中共北京区委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北方区委),统一领导整个北方,即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北到内蒙古广大地区的革命工作。区委由李大钊任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成员还有范鸿劼等。肖子璋(肖三)任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陈毅任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区委下面还设立了几个工作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由赵世炎兼书记,陈为人等为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李怀才任书记;国民运动委员会由于方舟任书记;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有夏之栩、刘清扬等。北方区委下辖北京、保定、张家口、太原、天津、唐山六个地委,以及南口、宣化、大同、乐亭、邢台、正定、哈尔滨、奉天、大连、晋县、石家庄、榆次、汾阳、绥德14个特别支部。赵世炎还主编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这个刊物当时曾发行到数

千份,在北方的工人、学生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鲁迅就曾是其热情的读者。《政治生活》和当时在北方翻印的《向导》周报,对北方的革命运动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此外,当时在北方地区还出版了《工人周刊》、《北京工人》、天津《工人生活》、《励进周刊》、张家口《西北风》等刊物,进行革命宣传。

北方区委成立初期,党的工作主要是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早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分析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制订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正确的革命策略。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①。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又指出:“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②。会议强调党应加紧北方国民军的工作,使之逐步革命化,变成有力的武装。

李大钊从实际出发,开始把对国民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帮助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实行联俄政策上。北京政变后,李大钊即多方奔走,力促国民军联俄政策的实现。李大钊亲自对冯玉祥、胡景翼等国民军领导人做工作,

就苏联政府援助国民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国民军的实力大大扩充，部队的素质也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构成严重威胁。

1926年3月，李大钊引介冯玉祥去苏联考察。刘伯坚、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向冯玉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使冯的思想发生变化，他表示要接受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还派国民党左派人士前往苏联进一步做冯的工作。在国内，李大钊或派共产党员或通过书信往来向冯玉祥部下的主要将领解释和宣传共产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并派共产党员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去，担任副官及其他职务，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活动。到五原誓师前，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170—180人，加强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的这些努力，使国民军的革命倾向日益增长，从而为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军驻扎的直隶、河南及察、绥地区，他们对共产党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基本上采取了中立态度。

北方各地的党组织，还充分运用国民党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李大钊当时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工作，担负着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共产党人于树德、褚松雪分任这个分会的学生部长和妇女部长。北方的国民党组织，也几乎都是由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这就为发展壮大革命的统一战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加强共产党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北方区委当时设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专管国民党的事情，由于方舟、陈毅具体负责。他们发展了大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输送给共产党或共青团，还派了不少得力的共产党

员到北京、天津等地国民党党部中去，加强这些地方党部的工作。这样，北方国民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扩大。到1925年10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属各地党员总数已达14000多人。为了使国共合作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亲密合作，团结中派，同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10月，针对国民党右派林森、邹鲁、谢持等企图强占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阴谋活动，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一封《致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国共合作，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服务，强调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必须加强团结，以“巩固我们对付压迫中国工人阶级与压迫中国民众的敌人的联合战线”^③。同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分裂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针对西山会议派完全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事实，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和演说中，一一予以揭露。由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坚决斗争，使右派分子日益孤立。

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李大钊和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很注意领导工人运动。他们以极大的努力，来恢复“二七”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1924年10月以后，党组织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有利形势，通过与国民军的关系，营救了“二七”罢工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帮助失业的铁路工人恢复了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铁路工人运动又重新发展起来了。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奉、京绥各路工会都差不多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也恢复了。除铁路工人运动外，北京地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迅速的发展。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了大多数行业。在“工人雪耻会”的基础上，1926年1月成立了北京总工会。天津、直隶一带的工人运动也蓬勃

开展起来。李大钊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了那里的工人罢工斗争，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形成。1926年初，天津总工会正式恢复活动。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党又在东北创办了《满洲工人》周刊，在奉系军阀统治的后方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在恢复、发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北京党组织再次开始了对郊区农民的工作，芦沟桥一带就是当时的宣传据点之一。到1925年底，京东地区已有七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其中顺义的会员达千人以上。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也都相继开展起来，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初，北方区委在区委党校组织了训练班，李大钊亲自为训练班讲解农民问题。同时，他还选送一批干部到广州，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学习。他们回到各地后，对那里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6年夏，据直隶、山西、山东、热河、察哈尔五省的不完全统计，已有农民协会50多个，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1925年至1926年间，京东的顺义、玉田、遵化，以及山西的一些县、内蒙的呼和浩特等地，先后掀起了农民抗捐抗税、反抗贪官污吏的怒潮。有的捣毁了税局，有的捣毁或焚烧了县政府、县议会，对封建军阀与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黑暗统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震撼了北方农村封建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

为了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李大钊在1925年底到1926年8月的《政治生活》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两篇文章。文章正确地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的途径，并提出必须依靠贫雇农组织农民协会，应该变旧式的红枪会为新式的农民武装。李大钊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

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因此，他号召革命的青年到乡村去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④对于北方各省农民群众自发的武装组织——红枪会，李大钊非常重视，他认为“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但是，他指出应将旧式的红枪会，改造成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只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⑤，完成推翻封建统治的任务。

北方区委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于1925年冬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由罗亦农担任校长，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陈启修等担任教员，瞿秋白、刘伯庄、肖子璋等也曾到校讲课。党校第一期学员有百余人，来自北方各地，学习时间约一个月，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工作。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党的基础知识、时事政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课程。李大钊对这个为党和革命培养骨干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常常亲临指导，并亲自讲授《土地与农民》。这所党校不但为壮大北方地区的革命力量培育了骨干，而且也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选送了人才。

在此期间，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也有所开展。1925年冬，李大钊亲赴张家口主持了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书记，赵世炎为副书记。这个大同盟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内蒙古开展工作的主要阵地。1926年4月至7月，在国民军从北京撤至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过程中，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发动蒙汉各族人民和国民

军一起进行斗争，牵制了北方的反动军阀力量，支援了南方的革命运动。

北伐前夕，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方各级党组织团结工农兵学商各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加速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步伐，为北方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1925年10月，帝国主义为了缓和“五卅”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同意北京政府邀请各国驻华外交官举行关税会议。帝国主义口称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以中国不能实行的废除厘金为先决条件，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关税自主，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关税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北京地区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关税会议开会期间，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的一系列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从而推动了当时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促进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

通过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对段祺瑞卖国政府切齿痛恨，亟欲把它推翻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天津一带驻守的国民军，表示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愿意支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于是，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与国民军的统战关系，联合国民军的力量，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把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发展成为一场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斗争。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等五人组成的指挥机构。区委还派于树德与国民军联系，国民军答应不派军队保护段

政府，而派军队保护民众，并支持推翻段政府后成立国民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 secret 准备，区委决定1925年11月28日开始行动，目标是夺取段祺瑞执政府的重要机关，以打乱段政府的指挥系统，使其陷于瘫痪，迫使段祺瑞下野，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筹备和召开国民会议，产生正式的国民政府。

28日，被称为“首都革命”的这场斗争爆发了。当天上午，各学校、工厂的学生军、工人武装保卫队、敢死队同时出动。北京城内贴满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言》、《告国民军书》等传单和各种标语，建筑物上到处竖起了鲜艳的红旗，革命气氛十分浓烈。下午，神武门前已是万众云集，当即召开了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挂着“打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巨幅对联和“国民军同胞啊！你们要起来与民众一致奋斗，为国努力，组织国民政府，打倒卖国贼”的大幅横标。会场上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建设民众的武力”、“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解散关税会议”的口号。大会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即日在京组织国民委员会；（二）此国民委员会之任务对内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对外实现国际平等，召开国民会议；（三）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大会发布的宣言指出：“中华民族为求民族的生存，民权的实现，民生的畅遂，推倒满清帝制，辛亥革命经十四年，外来的帝国主义者，与帝制余孽之军阀，横断我发展之前途，历经袁、黎、徐、曹至段祺瑞而益厉，今我国民完全觉悟，必须以国民自己的能力建设国家，始能达到共和之目的。”⑥会后，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手持木棍、铁棒等，挥动着写有“杀卖国贼”、“扫除安福余孽”的小旗，以一面上书“首都革命”的大红旗为前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权”、“驱除关税

会议的各国代表”、“释放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被捕战士”、“打倒帝国主义”、“驱逐段祺瑞”、“拥护广东国民政府”、“召集真正代表国民的国民会议”等口号，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占领了邮电局、警察局，赶跑了警察总监。包围段祺瑞住宅的群众，准备在举行公审后驱逐这个卖国贼，但因段宅有国民军驻守而不能进入，愤怒的群众旋即捣毁了章士钊、朱琛、叶恭绰、李思浩、曾毓秀、刘百昭、梁鸿志等北京政府官吏的住宅。

第二天下午，北京群众5万余人又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推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等标语，台前还悬有揭露段祺瑞十大罪状的横标。赵世炎、陈启修、马寅初、王一飞等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通过“即日起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惩办卖国贼，先行查封其所属财产”、“由国民通缉卖国贼听候国民公判”等决议，并通过了致国民军的通电、致全国各地的通电和警告段祺瑞书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30日，北京工人、学生继续举行示威。连日来的群众示威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潮。

北京人民的革命壮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对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表示敬意，号召国民党员“不畏牺牲，不避艰险，凡遇示威战斗，当奋身站在民众前列，为民众之领导与护卫。”并表示：“本党将悉其能力，号召全国革命民众，为北方民众有力之后援。”^⑦全国学生总会致电北京学联及各团体，完全支持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电文指出：“严惩国贼，薄海腾欢，望坚持奋斗，总会誓领导全国同学，并振拔上海民众，以为北京后盾。”^⑧全国总工会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当乘机推倒卖国殃民之段政府。”^⑨12月5日，南京市民万余人召开大会，响应北京壮举，要

求段祺瑞下野，组织国民政府。6日下午，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工人代表会、上海市民协会等六团体发起在上海闸北东方大学召开上海市民反段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同日，包头市商会、农会、铁路工会等数十团体、数千群众召开大会，议决赞助北京民众的爱国运动。12月20日，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工、农、学、商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游行。中午，10万群众齐集广州市东较场举行大会，通过支持北京人民反段运动的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众高呼“打倒一切反革命！”“收回关税主权！”“打倒段政府！”等口号，沿途散发的传单达四、五十种，数十万份。此外，武汉、郑州、长沙等地的工人、学生、市民，也都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支持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

由于国民军上层人物的动摇，下层士兵没有很好发动起来，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人事先向军阀政府告密，并造谣破坏，国民军相信了右派分子关于共产党要成立工农政府、赤化北京的挑拨，借口泄密，难以响应，背弃了武装进城与人民合作的诺言，致使这次革命运动提出的推翻段祺瑞反动统治的目的未能实现。

“首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这次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充分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力量，对反动军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削弱了军阀势力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压力，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以“首都革命”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奉倒段的国民运动。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象广州那样的革命政府。这对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北伐战争前夕能够形成高潮，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在这个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广大党员积极地投身于革命运动，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和

战斗作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党正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同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大大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使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是在这个正确纲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正是在这个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在北方地区实现了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调动千百万革命群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伟

大的篇章。尽管北方的革命运动与全国的革命运动一样在后来出现了曲折，但这次革命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后来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400页。
-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集，第30页。
- ③ 《政治生活》第56期。
-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24、833、834页。
-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875、876、877页。
- ⑥ 《京报》，1925年11月29日。
- ⑦ 《政治周报》第2期，第1页。
- ⑧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4日。
- ⑨ 《申报》，1925年12月17日。

(上接第126页)

12月16日，李济深冲破了各种势力的重重包围，毅然秘密离港奔赴解放区，参加我党领导的创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海船经过孙中山早年就读过的玛丽医院，航行五天始出台湾海峡，在灯塔指引下日夜兼程驶向大连。海上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恶浪突起。李济深与同行的民主人士心潮翻腾，不时交谈着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航程。他在沈雁冰的手册上不无感慨地写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①翌年初抵达解放区，他在一个声明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②。这个结论正是他奋斗一生找到的真理，是他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李济深担任了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职务，一直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在他与世长逝前的四天，写下了他生前未竟的遗愿：“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③

注释：

- ① 《人民日报》1985年11月7日。
- ②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9次会议纪录。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③ 《李济深诗文选》第4页。
- ④ 《李济深诗文选》第148页。
- ⑤ 林伯渠：《李济深先生，永远安息吧！》(1959年10月12日)
-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页。
- ⑦ 《李济深诗文选》第43页。
- ⑧ 谢和庚：《忆李济深》见《纵横》1986年第1期。
- ⑨ 《李济深诗文选》第158页。
- ⑩ 《李济深诗文选》第16页。
- ⑪ 《关于李济深等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3月31日)，原件存上海市档案

案馆。

- ⑫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6页。
- ⑬ 林伯渠：《李济深先生，永远安息吧！》(1959年10月12日)
- ⑭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610页。
- ⑮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1页。
- ⑯ 香港《华商报》1948年11月5日。
- ⑰ 据《李宗仁回忆录》。
- ⑱ 《李济深对美英记者谈新政协与新政府》，香港《华商报》1948年11月3日。
- ⑲ 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
- ⑳ 《李济深诗文选》第76页。
- 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于时局声明》(1949年1月17日在沈阳)
- ㉒ 《李济深诗文选》第36页。